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红 与 黑



1



大众文艺出版社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00081 BEIJING, CHINA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红与黑



中国文学名著丛书

红 与 黑

〔法〕司汤达 著
张朝栋 译

(一)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与黑/(法)司汤达(Stendhal)著;张朝栋译.-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6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ISBN 7-80094-714-9

I. 红… II. ①司… ②张… III. 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15040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1.5 字数 514 千字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

前 言

亨利·贝尔（1783—1842）笔名司汤达，是十九世纪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曾经指出：“司汤达是在资产阶级胜利之后，立即就开始敏锐而明确地表现它的特征的第一个文学家，他揭示出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腐化的不可避免和它的愚蠢的短见。”路易·阿拉贡明确肯定：“他对小说，对写作，从而也是对作家是什么，作家的任务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上，体现了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司汤达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丰富的社会内容。进步的文学观点和创作实践奠定了他在法国以至欧洲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司汤达出生在法国格勒诺布尔城一个富裕律师的家庭。早年丧母，父亲是个保皇党人，家庭教师是个思想保守的神父。司汤达与他们格格不入。在家里，他只敬爱拥护启蒙主义的外祖父甘尼永大夫。他曾说：“我完全是由我那可敬爱的外祖父亨利·甘尼永教育成人的。”

十三岁那年，他进了由当地革新派创办的中心学校读书。教师向学生宣传科学与民主。这种进步的教育，奠定了司汤达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中学毕业后，经由亲戚的介绍，他参加了拿破仑的军队，曾经远征意大利，经历过马伦哥战役，这些经历后来被

他艺术地再现在《巴马修道院》一书对滑铁卢战役的精采描绘中。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承认正是司汤达教会了他怎样理解战争。一八〇一年，他辞去军职，定居巴黎。这期间他勤奋攻读爱尔维修、孔狄亚克、卡巴尼斯等军人的著作，致力于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文学上醉心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初步形成了他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一八〇六年，他再度从军，跟随拿破仑进驻柏林，曾任皇家领地总管、军事委员会专员、皇家器物总监督等职。一八一二年，随军远征俄罗斯，亲眼目睹莫斯科的大火和拿破仑的溃败。第二年，他又参加了拿破仑抗击反法联盟的战争。一八一四年，联军攻占巴黎，拿破仑退位。法国波旁王朝复辟后，司汤达已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一八一四年，我和拿破仑一块下台了。”

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二一年，司汤达侨居意大利的米兰市，从此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第一部作品是音乐家传记《海登、莫扎特、梅达斯泰斯的生平》，首次以司汤达的笔名发表的作品是著名游记《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

司汤达侨居意大利期间，正值意大利人民苦难深重的年代，也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期。他同情这场争取自由的斗争，并与领导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烧炭党人过从甚密。一八二九年发表的短篇力作《法尼娜·法尼尼》就是描写烧炭党人的革命活动的。司汤达对意大利怀有特殊的感情，根据他的遗嘱，死后他的墓碑上刻着这几行字：

亨利·贝尔

米兰人

写作过

恋爱过

生活过

可见他已把自己看作是意大利人了。一八二一年，他被警察当局视为“极端危险”的人驱逐出境，回到巴黎。

司汤达返回巴黎后，生活贫困，对巴黎的一切都深恶痛绝。他不仅在文艺沙龙里抨击时政，而且化名为英国报刊撰写巴黎通讯，揭露丑恶的法国现实。这些文章在他去世后收编成《英国通讯集》。这期间，他先后写出了心理分析巨著《论爱情》和参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论战的文章结集《拉辛与莎士比亚》。司汤达所谓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就是指现实主义。《拉辛和莎士比亚》是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第一部理论文献，有着深刻的影响。一八二七年，司汤达的第一部小说《阿尔芒斯》问世。小说的副标题是“一八二七年巴黎一个沙龙的若干场面”。虽然这部政论小说尚未充分展示司汤达的艺术才华，但已能说明他对当时现实的关注和尖锐的批判力。一八三〇年出版了“以其政治激情令人颤栗”的杰作《红与黑》。这部长篇小说展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社会的广阔图景，揭示了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它的历史真实性、思想进步性以及把政治分析与心理分析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都达到了完全成熟的高度。因此，它被称为法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先驱，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法国政府任命司汤达为驻教皇管辖下的滨海小城西维达——维基亚的领事。他任此职直到逝世。但是，这时他已是虽在其位不谋其政了。他长期住在巴黎从事创作，写出了反映七月王朝金融资产阶级统治虚伪本质的小说《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意大利遗

事》、《回忆拿破仑》、《一个旅游者的见闻录》等著作。

一八三八年，司汤达用五十二天时间完成了另一部长篇巨著《巴马修道院》。小说表面上描写的是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却是影射当时的法国社会。司汤达才华横溢，勤奋笔耕，尽管著作等身但生前文名寂寞。《巴马修道院》是他生前唯一获得成功的作品。小说出版后，巴尔扎克推崇备至，立即写了一篇长达七十二页的评论——《贝尔先生研究》，承认司汤达是“当代高人之一”。他在给司汤达的一封信中说：“《修道院》是一部伟大的巨著……我画壁画，你塑意大利雕像……。这一次，一切是独创、新颖。”巴尔扎克的高度评价使司汤达感激涕零。

司汤达在世时默默无闻，他宣称到一八八〇年才会有人读他的作品，一九三五年才可能被人理解。现在，七十九卷的司汤达全集已经整理出版，法国还有专门研究“司汤达学”的学术组织。凡此都清楚地说明人们对这位生前遭到不应有冷遇的作家的重视和崇敬。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死而无憾。

《红与黑》是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鸿篇巨制，也是司汤达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小说的素材取自一八二七年巴黎《司法公报》上的一则情杀新闻。铁匠的儿子安杜扬·贝尔特经神甫推荐，去米苏家担任家庭教师。不久他和孩子的母亲发生了暧昧关系，真相暴露后，出于怨恨和绝望，贝尔特在教堂枪杀了米苏夫人，因此被判死刑。司汤达根据这条社会新闻，构思一部题名为《于连》的小说，但两年后还没有写成，因为这桩普通的刑事案件无法体现他痛恨封建复辟的政治见解。于是他重

新构思并着手改造情节，把保皇党的阴谋活动作为中心事件写进小说，又把书名改成《红与黑》，再加上副标题“一八三〇年纪事”。这里，作者想把《红与黑》写成一部政治小说的创作意图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有一段出版家与作家的对话：“如果您的人物不谈论政治，那么，他们就不再是一八三〇的法国人了，而您的书也就不再是一面镜子，如同您所希望的那样……”可见司汤达毫不隐讳这部小说的政治倾向，他要认真写出“十九世纪最初三十年间压在法国人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一八三〇年前夕教会和国家的欺骗、厚颜无耻和虚伪”。小说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真实而深刻的描写，更在于他对时弊的猛烈抨击。高尔基曾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把一桩极为寻常的刑事罪提到了对十九世纪初叶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哲学研究的高度。”

书名《红与黑》具有象征意义。作者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书名，后人作出各种解释，至今尚无定论。司汤达曾在《红与白》的原稿上写道：“《红与白》，为了唤起关于《红与黑》的记忆，为了给记者们提供一些报道材料，红：共和派吕西安；白：保皇党少妇沙斯特莱。”这个揭示是理解《红与黑》书名象征意义的重要线索，表明了作者总是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观察和反映社会现实的。这是司汤达有别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特点。

《红与黑》中译本在我国出版以后，有人认为，作者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于连的恋爱事件，因此指责它是一部没有社会意义的爱情小说。我们则认为，无论从司汤达的创作意图或作品揭示的具体内容来看，《红与黑》都应该算是一部充满着批判激情的政治小说。

为了正确评价这部作品，首先必需正确理解司汤达爱情

描写的实质。《红与黑》中的爱情描写起着推动情节发展的作用，而且也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尤其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正是通过这个“窗口”作者让我们目睹了短兵相接的阶级冲突。

于连在他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经历了两次恋爱风波：一次与德·雷纳尔市长夫人；一次与名媛淑女玛蒂尔德小姐。他的生活史似乎以爱情开始，又以爱情结束。爱情成全了他向上爬的野心，同时也断送了他的生命。如果我们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这个表面现象上，那末，除了看到于连的爱情纠葛外，便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发现了。然而，作者在翰墨淋漓地描绘于连的情海沉浮时，却特意强调指出：“像于连这样具有几分才华的年轻人，主宰他们命运的也绝不是爱情，”司汤达插此一笔显然希望读者不要陷入认识的误区。

于连属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后出生的一代青年。这类青年不安于现状，雄心勃勃，渴望创造丰功伟绩。于连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典型代表。于连受启蒙主义者和拿破仑的影响，确立了这样的信念：“高度的精神发展完全能保证他们有相应高度的和独立的社会地位，保证思想和意志的自由。”他向往拿破仑时代仅凭才能和勇敢，三十六岁就可擢升将军的锦绣前程。但是，复辟时期等级森严的现实彻底粉碎了这个平民子弟的英雄梦想。因此，他极端仇视压制他个性发展的统治阶级，仇视委琐、卑劣的社会风气，并采取“个人游击战”的方式进行反抗，爱情便是这种反抗的突破口。作品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最初的动机而言，于连从来没有真心诚意地追求过爱情，他只是把爱情当作向社会等级观念挑战的一种手段。在爱情的阵地上，他发起了一场特殊的战争。面对两位贵族女性，他决心实现的目标是征服。他

勾引德·雷纳尔夫人为了的是打击市长的妄自尊大，而在与玛蒂尔德小姐周旋时，由于他的平民自尊心经常受到伤害，反抗的方向愈加明确。他说：“出身的骄傲，犹如一座高山，形成了她和我之间的军事阵地。那座高山，便是我进攻的目标。”与其说这是恋爱，不如说更像“战争”。即使当他追求玛蒂尔德获得成功后，他也并不感到爱的幸福，感到的只是胜利者的满足——“这个傲慢的女人，终于拜倒在我的脚下了！”

于连企图冲破等级限制的爱情冒险，最后导致自身的毁灭。统治阶级决不允许像于连这样的平民百姓挤入他们的世袭领地分享他们的权力和财富，于是千方百计地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在于连的爱情故事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复辟时期平民阶级与贵族阶级严重对立的事实。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阶级对立决定了于连必然死亡的命运。因此《红与黑》实际上是一出个人与社会冲突的悲剧。司汤达通过爱情描写对阻碍人正常发展的黑暗现实作了极其尖锐的政治批判。这才是对《红与黑》中爱情描写的正确理解。

《红与黑》的批判锋芒指向封建贵族、反动教会和资产阶级，从而揭示了法国社会的本质特征，深刻地表现了反对封建复辟的基本主题。

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前夕，贵族阶级和保皇党人预感到末日来临，企图作垂死挣扎，保住摇摇欲坠的封建政权。小说中描写了由德·拉莫尔侯爵精心策划的一次黑会，决定组织自己的武装力量再呼请英国出兵，以便里应外合，扑灭即将燃起的革命烈火。然而，历史的潮流无可阻挡。这次阴谋活动不过是统治阶级临终前疯狂的一跳而已。

司汤达极其憎恶教会的伪善与阴险。他说过：“这部描写当时社会风气的小说最精采的部分，是写于连在神学院的那些章节。”大革命时期教会的反对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王政复辟后教会又夺回了失去的天堂，气焰更为嚣张，成为操纵政局的一个特务机构。可以说在司汤达的眼里教会与统治者狼狈为奸的一丘之貉。此外，教会还对人民进行欺骗性的宗教宣传，为巩固封建统治效力，是贵族社会重要的精神支柱。司汤达痛恨教会的罪恶，猛烈抨击教会在政治上的反动性。

在复辟时期，从形式上看，封建贵族高高在上，不可一世，但在实际生活中真正处于支配地位的却是普遍盛行的资本主义的利益原则。

作品真实反映了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发迹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化的历史特征，同时也嘲讽了人与人之间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有利可图”主宰了维里埃尔城的一切。贫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世袭贵族德·拉莫尔侯爵、市长德雷纳尔都将此奉为处世的原则。它甚至概括了这座小城绝大多数居民的思想。这条原则使得维里埃尔“时刻存在着失败的恐惧时刻，存在着奢侈和贫困的斗争”，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给人们带来的灾难。

“有利可图”的法则也破坏了家庭关系。司汤达对世态炎凉刻画得穷形尽相，入木三分。于连被判处死刑后，老索雷尔探监，但他并非出自对儿子生死的关心，而是为了儿子的遗产。当于连知其来意说出要把大部分的钱都给他时，利欲熏心的老索雷尔竟喜形于色：“那很好，这其余的理应归我……如果您希望像一个好基督徒那样死去，那就应该偿还您的一切债务……”离死期不远的于连听到这番话，痛心地

感叹：“瞧，这就是父爱！”父子之情已完全消溶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父子关系原来也不过是一笔现金交易！

司汤达在这部小说中以其不可抑制的批判激情，汪洋恣肆的笔墨，辛辣地讽刺了丑行败俗，对倒行逆施的复辟王朝作出了全面的政治否定。

这位以雅各宾党人自居的作家曾经生动地把小说比作“音乐会”，把政治比作“音乐会”上的“枪声”。在《红与黑》里，我们不是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枪声”吗？

《红与黑》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塑造了主人公于连的艺术形象。他是波旁王朝时期进行个人奋斗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典型。小资产阶级具有两重性，既有反对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一面，也有与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的一面。这种阶级地位决定着他对现实社会既反抗又妥协的特点。

于连的性格很复杂，充满着真诚与虚伪、肯定与否定、积极与消极正反对立因素的矛盾，所以才显得真实，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

启蒙主义哲学家反对社会不平等、维护人格的思想培养了于连强烈的平民意识，他对拿破仑靠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二十岁被提升为将军，三十六岁就“征服”欧洲，当上“世界主人”钦佩得五体投地。因此，他把拿破仑看作是光明的化身，一生行事的榜样。但在波旁王朝当权的年代，设下一道道门第、血统、资历的障碍，于连得不到发迹的机会，还不断遭到迫害。他的悲剧决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平民青年英雄无用武之地，无法实现自身价值的悲剧。他代表着这一代青年普遍的命运。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于连对拿破仑的崇拜完全是从追求个人的荣誉、权势和幸福出发的，这种由法国大革命在小资产阶级身上所唤醒的“积极性”不能不

带有利己主义的性质。于连在奋斗过程中顺利时妥协、挫折时反抗，其根本原因盖出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中曾明确指出：“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的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正是这种阶级局限使于连始终找不到怎样与特权斗争的有效途径，才选择了以虚伪作为个人奋斗的武器。“用答尔丢夫的办法去对待答尔丢夫们。”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苏联文艺评论家布尔索夫在评述于连时写道：“将丰富的智慧和高尚的精神同无耻和伪善结合起来，这就是司汤达长篇小说《红与黑》中的主人公于连·索雷尔的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正因为于连的性格由相反两极构成，充满丰富的矛盾内容，他才成了不朽的艺术典型。

于连的性格发展是在德·雷纳尔市长家、贝藏松神学院、德·拉莫尔侯爵府第这三个典型环境中完成的。司汤达有意识地从“社会制度决定人们命运”的原则出发“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能够历史地、具体地描绘复杂的社会环境，以及在这个环境影响下人物性格的变化，并通过人物反映出社会的本质特征，从而把环境与人物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于连在德·雷纳尔市长家里第一次登上人生舞台，开始接受社会教育。家庭教师的屈辱地位使他对贵族社会的阶级差异和贫富悬殊极度敏感。在市长家里，他大开眼界，看到了资产阶级的败行劣迹，看到了各种各样损人利己的阴谋诡计。谢朗神夫这样开导他：“你也可能发迹，但那必须损害穷人的利益，奉承区长、市长，巴结达官显贵，卑躬屈膝投其所好，这种行为，就是尘世间所谓的处世之道。”于连开

始认识到在这个利己主义的沙漠里，要想立足升迁，只能以虚伪的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去猎取功名财富。他发誓：“只说那些他认为是虚假的话，决不谈论真实的事情。”他终于学会了虚伪，在野心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官场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对于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已发现凭学识和才干难以获得成功。当时四十岁左右的神父有三倍于拿破仑手下著名将领的收入，于是他立即决定通过教会的阶梯去攀登他理想的高峰。

如果说于连在德·雷纳尔市长家时还经常显示出正直的品格，表现出傲慢的反抗，那么在神学院的十四个月里，他很收敛自己，变得更加虚伪自私了。

神学院阴森恐怖，那些利欲熏心的神父们都是伪善的无耻之徒。教士们相互猜忌、告密、谄媚、倾轧，受到这种环境的腐蚀，于连几乎变得和他们一样恶劣。他明明是无神论者却扮演成虔诚的教徒，颇得皮拉尔院长的赏识。阴暗的神学院把于连变成了伪君子，同时也刺激了他向上爬的野心。

于连到巴黎担任德·拉莫尔侯爵的私人秘书是他性格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于连的个人奋斗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同时也遭受了最后的失败。

巴黎是“阴谋和伪善的中心”。这时于连已日趋成熟，懂得怎样以虚伪抗击虚伪。他效忠主子的机灵，博得侯爵的赏识。在情场角逐上也旗开得胜，费尽心机终于征服了德·拉莫尔侯爵的宠女玛蒂尔德小姐，于连完全“陶醉在野心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性消失殆尽。然而，好景不长，正当他志得意满时，在阴谋策划下，德·雷纳尔夫人寄来一封告发他诱骗的信，葬送了他的锦绣前程。于连狂怒之下急奔维里埃尔城，向正在教堂的德·雷纳尔夫人开了两枪，当场

被捕被判处死刑。

于连入狱后如梦初醒，开始重新审视现实，他终于明白将他置于死地的真实原因是因为他想突破阶级限制跻身于上流社会，这是统治阶级所绝不允许的。他对复辟社会已深感绝望，所以拒绝上诉，拒绝忏悔，以死相抗，决不妥协。他赴刑前在法庭慷慨陈词：“先生们，我丝毫没有这种荣幸属于你们那个阶级，你们在我身上所看见的，是一个反抗自己卑贱命运的农民……你们仍想利用我来惩罚我所属的这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挫败他们的勇气。这些年轻人虽然出身卑贱，也可以说，受到贫困的压迫，但是却有幸获得过良好的教育，敢于跻身于有钱人引以为骄傲的所谓的上流社会之中。”这段独白切中时弊，一针见血，充分表达了被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扼杀了全部活力和希望的一代人的愤怒与控诉。

于连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通过他反抗——妥协——反抗的生活道路揭示了复辟时期平民阶级与贵族阶级的严重对立，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自由、平等的渴望、对封建制度的不满，表现了不同时代不同的价值标准在他们身上所引起的矛盾和冲突。

《红与黑》之所以成为一部历久不衰的传世佳作，不仅因为它具有进步的思想内容，也因为它具有宝贵的艺术价值。

司汤达与巴尔扎克是法国同时代的两位文坛巨擘，他们的作品都拥有广大的读者，但他们反映现实的手法绝不雷同，各有千秋。

巴尔扎克利用《人间喜剧》的系列作品描绘整个法国社会，而司汤达采用的是个人传记的形式，《红与黑》、《吕西安·娄凡》都体现了这个特点。虽然传记小说盛行于十八世

纪，但司汤达在他的传记作品中表现了环境与人物辩证统一的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司汤达要在一部小说里概括巴尔扎克几部小说乃至几十部小说所要表达的内容，不能不对情节的处理和结构的安排匠心独运。司汤达善于择取典型环境，提炼典型情节，刻画典型性格而且高度凝炼并布局成严谨的结构。这方面《红与黑》提供了成功的经验。《红与黑》通过对于连生活中几度沉浮的真实记录，展示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本质特征。环境、情节、人物紧紧相扣交织成有机的艺术整体。叙述讲究逻辑分明，语言质朴、明净。

司汤达尤其擅长心理描写，以心理小说大师著称于世。《红与黑》中写于连对三个典型环境（维里埃尔市的唯利是图、贝藏松神学院的宗教专制、巴黎贵族社会的阴谋与伪善）的感受与反应，决定命运关键时刻的内心冲突和思想变化都具体入微，引人入胜。从心理活动的折光镜上，我们看到了于连的勇敢与怯懦、骄傲与自卑、狂热与郁闷，看到了罪恶的现实如何扭曲他的人格以及他在伪善的道路上所经受的矛盾与痛苦。于连从启蒙学者和拿破仑那里获得追求平等的观念，激发了他小资产阶级公民的积极性，正是这种观念和积极性支配着他的一切心理活动。我在一篇论文中作了这样的总结：“于连悲剧性的奋斗史清楚地说明了，不合理的社会存在是造成他全部心理反应和行动方式的根本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可能成为英雄的青年，在复辟时代只能惨遭毁灭。由此可见司汤达现实主义心理分析的深度和力量。”

司汤达生活和创作的年代，法国和欧洲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的变革。他经历了拿破仑帝政、复辟王朝和七月革命等时期，在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的殊死搏斗中，在十八世纪启蒙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他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先进的